

《不同文化、社会和全球挑战背景下的教育》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主席、前巴州文化部长
蔡特迈尔博士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致力于增进巴伐利亚州和中国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合作已走过了 25 个年头。在我就“不同文化、社会和全球挑战背景下的教育”这一主题发表看法前，请允许我简要的回顾一下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关系。

早在 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通过国家教育部和对外友协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建立在友好平等、相互尊重、同等高度的基础上，贯穿了过去的 25 年，为我们相互间富有成效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 25 年的合作中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贵国的合作已形成了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合作关系网络。与中国教育部及其下属机构的合作致力于各层面的教育改革，在这方面，中国建设部也是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在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合作框架内，双方互派高级代表团就不同政治领域开展了积极的对话。2002 年，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以后，双方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正如贵国政府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妇女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与中国国土资源部的合作中，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久前，巴伐利亚州还是个农业州，由于政策得力，重视农村发展，它如今已发展成为世人公认的科研、科技产业和媒体大州。

在与中国教育部及其所属部门的合作框架内，我们已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建立起 12 个培训和职能中心，作为示范项目，这 12 个培训和职能中心为中国从儿童早期教育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各层面的教育改革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有了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北京信息和协调中心，中国教育部和其他中央合作伙伴与汉斯·赛德尔基金就有了一个汇集各种信息和工作成果的中转站。

通过各种合作项目，我们今天已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我们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开展教育的创新工作，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政治对话。

这种网络今天已延伸到中国的西部省份，在中国教育部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甘肃、宁夏、青海、云南、西藏、贵州和广东等省份签署了具体合作协议，各项合作正在积极地展开。与这些省份的合作目的是为了逐步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我们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在较发达省份建立起来的培训中心在与西部省份的合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它们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都为提高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教育质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西部开展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有：

- 召开信息会议、研讨会和学术讨论会
- 提供教育咨询
- 对教育主管机构和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的骨干、优秀教师及校长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
- 根据实际情况为当地制定教育大纲、编写教材和辅导材料
- 监控和评估教育成果，保障教育质量

我们的教育和职能中心可以向西部省份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我认为，上述列举的部分工作已经体现出人们在教育政策方面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此，我要衷心的感谢遍布中国东西南北的中方合作伙伴，他们积极参与促进西部发展，发扬了无私的援助精神。我们共同的愿望应该是中国所有的公民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将为缩小中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和保持国家的稳定做出积极、持久的贡献。我们希望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中国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前面我提到了培训和职能中心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工作，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今天，我们要面对和处理下面一系列问题：

- 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开展儿童的早期教育？这在德国也是被经常讨论的热点议题之一
- 学校发展和教育领域领导人员的专业化
- 新学科的开发、试行和引入，例如在中学开设劳动学、经济学与法学课程
- 借鉴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模式开展职业教育及为技术工人提供升迁培训乃至上大学的机会（如职业学院）
- 根据国际标准开展面向未来的、受双重认可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教育
- 近年来，中国和德国大学在高校领域自由结合，在“科学合作”的理念下建立了一个科学能力网络。八月底在青岛大学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题为“国际语境下的科学合作”。论题有“科学合作中的多种语言”、“文化和文化政策”、“科学和职业”。我补充这一点，是想让大家对这个项目有所了解，特别是这些论题与我在庆典上的论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还有很多内容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列举。大家就参阅一下我们的纪念册，它通过大事记的形式展现了合作的发展历程。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进入正题。

我们的合作当时看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1980年正值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协定签署十周年。今天，我们的合作映射了世界的挑战，所有人都处于全球化及其反作用的影响之下：它涉及合作地构建、保障我们个体和集体的生活。这就必须具备跨文化相互理解的知识、能力和本领。掌握所有这些能力的关键就是“教育”。

过去的25年里，教育是我们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核心，我们今天可以骄傲的回首这一历程——从职业领域的手工业和工业培训，到高等职业培训，再到大学里的硕士专业。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今天做的教育工作比当初开始合作时所认为的显得更加重要。正如德国的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所说，**教育已经成了一个“特大议题”**。

1997 年，罗曼·赫尔佐克简要地描述了 21 世纪教育体系的内容和目标，阐明了一种教育模式的六个支点。一种优秀的教育体系应具备六大特点：

- 以价值为导向
- 结合实践
- 国际化
- 形式多样
- 公平竞争
- 有时代针对性

我认为，这些要求我们可以基本表示赞同。

尊敬的各位来宾，当今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必须从头学起，欧洲的古人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为学校，而是为生活在学习**。孔子也有过非常类似的表述。

请允许我就这一任务作详细的阐述。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挑战有：

- 人口增长和世界经济差距
- 市场全球化的两面性
- 移民潮和其他贫困的后果
- 人口的变化
- 探寻同一性和民族的竞争
- 交通革命、媒体革命直至互联网

此外还有：

- 知识爆炸
- 我们生活环境的技术现代化
- 自然资源的生态问题

- 妇女的平等权益；金钱万能和生活标准物质化，德国有些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它的危险性，他们——比如沃尔夫·雷佩尼斯——要求价值的科学回归。

近些年，欧洲统一进程在我们国家使僵化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思路开始松动。

翻天覆地的改变让有些人认为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如果德国文化部长大会要求从医学到哲学的每个专业现在都必须有“职业培训”，这一变化可以看作对 1999 年 6 月 19 日签订的《博罗格纳协议》有些夸张的补充，*其实培训质量还远远是个未知数，需要进一步讨论。*

《博罗格纳协议》是什么？它首先是关于年轻人的职业能力！而不是关于某种职业实践或是教学大纲指出的单一的职业道路。它更多谈及了年轻人谋生的**工作能力**。这种构想包括人的“个体价值”、“团队能力”、“社会能力”和“企业家的行为能力”。它是关于年轻人在劳动体系中的生存机会以及这种机会导向对我们教育主导概念的反作用。

如今，其实所有的教育方案都在衡量它对人的生活能力以及“职业能力”的帮助。这一定论对许多科学领域来说想必也是非常新颖的。

在教育理论的传统中这却不是什么新的呼声，自歌德以来德国一直把人应具备的充满责任感的“生活能力”放在自己教育方案的中心位置。

我认为，社会的才智、能力与构建、创造我们未来的能力有关，它关系到未来的发展。所以目前所有的大学都有外界委员会，他们帮助大学避免随意研究课题。“科学”机构的发展将来要有计划地走在个人科学工作的前头。行政机构指明研究和学术该往哪个方向发展，还应像企业那样制定标准，说明什么能得到经费资助，什么不能。

正如前不久一位科学部长所说，在德国人们基本上一致认为，这不是组织问题的改变，而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思想的变更，目的是达到中小学和大学的“文化变革”。

现在的变革是德国自威廉·冯·洪堡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教育改革。这场变革特别针对从前人文科学的很大一部分，因为事实上这些部分多数因为

理所当然的历史原因、利用一种特别的距离概念把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抛在一边，学习与职业有关的东西常被当作“不科学”而横遭拒绝，文化这个上位概念受到宠信，它把人、劳动、职业与艺术、戏剧、文学严格区分开来，只把分开的那部分作为关注的焦点。

这种分割和缩减，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从没有参与过。德国的交响音乐团和剧团从来都比其他欧盟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这不乏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原因。文化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巴伐利亚的啤酒花园与巴伐利亚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既是文化的骑士也是它的载体。“工作能力”也是文化实践的一个因子。

如果我们谈起德国或者中国的文化、谈起合作，我们指的也是这个大的文化概念。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使交往富有建设性，人们就不能把主导性的文化概念置于中心绝对化，而要让它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交往和变通能力，才能活力永存。

变通能力是人生存的条件，因而也是文化生存的条件。我们的问题和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随意给定的，而是通过提出问题、加以理论设想确立下来，并在既定的文化理解框架内发展，这一过程就像经济界对可能生产的产品的构思一样。这个定论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范畴，特别是文化科学。尤其是它们的课题既是个体思想的结晶，又是现实的文化分类结果。因而我们需要有（多元）文化意识的教育。

许多企业早就觉察到，成功的经济行为需要有意识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构想作前提。对我们而言，它基本涵盖了日常交往，还有科学交流。

对自己文化的理解认识是增强跨文化能力的根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也越来越需要被认识。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同样也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概念下研究这一课题。

科学也需要对深化多元文化教育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因为科学既需要各种学科，又需要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形成跨文化“合作认识”的方式。就像在乐队中，只有当合奏能力具备时才能产生各自发挥创造力所需要的环境。

现在每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90%的活动都依赖于人本身。这样，我们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不能单单围绕着“结构”来开展，它同时必须涉及到“人”，就像自然学家胡伯特·马克所说的那样。我这里指的并不是自我策划者，而是指有创造性的教师、发明家和研究人员。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着独创性。

不管人们想多确切地给这个概念下定义，独创性自然要偏离寻常的道路，并且注定要磕磕绊绊。所以我们需要能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独创性的教育科学政策。正因为此，我们才要把大学办成具有创新能力的机构，把教育问题重新当作中心问题来抓，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要迎接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就必须不断转变一直以来的教育思路：

1. 我们不应该把教育概念和教育内容只对准获取学习能力的过程，还应该考虑个体创造性潜力的发挥。不然的话，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会在通往职业生涯的途中丧失创新天赋，而这方面恰恰能体现他们的优秀，也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我们今天知道，创造性，这种不稳定、但又不可或缺的能力只有在创造性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出来，这种环境首先是通过自由和信任而获得开放的空间和一片自由的猎区。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在巴伐利亚州虽然实施了林林总总的精英计划，这一环境的发展仍然有不容回避的追补需求。

开放创造性教育就是开放思想的大门，它通往新知识、通往我们在知识爆炸时代特别需要的教育：在信息的海洋中获取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在实质性意义上需要间接和直接利用的知识。这些知识产生了新的生产和创造价值的发酵酶和目标，它存在于经济、科学、政治以及教育领域中，包括了这些领域和我们生活环境中的特点问题。

2.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无人能够做到学有止境。教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或可封闭的知识、能力体系，人们可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中获取它，并把它作为永不枯竭的知识源泉，受用三十年之久。

今天没有一所大学在为单一的可终身从事的职业培养人，大学所培养的只是一种能在不同职场工作的能力。换句话说，教育成了终身的任务和生存条件。它具体表现为“终身学习”。

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曾经再清晰不过地描述了这一势不可挡的新局面：

“对于所有的学科来说，要想在知识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把所有专业知识全都囊括进教育过程中是越来越不可能了。所有的教育途径，普通教育、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等都必须首先传授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使毕业生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德国科学委员会以及其余众多的专业小组、部委和局机关近年来都有十分类似的表述。

“**终身学习**”也相应的成为了教育和科学政策的中心议题。教育过程被一致理解为个人和整体的双重发展过程：

- 一方面是获取专业文化和行为知识，包括获得某种技能和方法的可操控过程，
- 另一方面是未知结果的、不可操控的**自我培养**过程。

1997年科学委员会的建议中（1997，43）对自我培养作了如下解释，“毕业生能自己负责拓展、深化与职业有关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保持最新水准，全面发展个性。”

所有的工作能力因此包含了个人承担责任的能力。

由于知识爆炸以及生活环境里文化变迁相应的加快，教育的主导概念就不能只限于**工作能力**，它必须定位在终身的**学习能力**上。

由于所有的工作能力都包括了发展文化变迁的创造性含义，而且这种变迁尤其是通过变革来推进的，所以“就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革新能力”就成了同一回事或同一种能力。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报告中相应的强调了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3. 在我们科学、经济、政治和个人交往国际化的时代里，在职学习的能力包括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今天它似乎已经成为所有领导者“多元文化的基础”。但是，它的意义何在呢？

它首先指的是能用他人的眼光看世界，把他人的视角纳入自己的思维中。这种能力似乎日益成为未来几个世纪共同解决世界问题的最保险的途径。

所以，我们要培养人们懂得这样的生活道理，即我们每个人相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他人，文化和民族作为标准和定向体系也是建立在与他人依赖共存的基础之上。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它的工作领域内一直在为我们需要的教师和教授们所应具备的职业形象出力。对我们来说，一个好的机械师或者一个好老师既不是某个狭小领域的专家，也不是样样精通的全才，而是有着丰富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包括具有生活中必要的批判和检验能力。

批判能力是指用知识、能力有意愿地检验并认同他人，以此作为构建自我的中心条件。

它包括以下三种意愿：

1. 把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视为同伴，若没有这种承认，共同生活作为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便不可想象；
2. 不管存在何种竞争都试图支持自己和他人进行自我塑造，树立形象，比如一张亲切的脸庞、一种外表，从而逐渐获得地位；
3. 有意识地参与文化遗产，它是文化记忆中价值创造的调整。

教育最终让拥有不同传统、语言、文化和性格的人进行有承受能力的合作，因为它让我们有能力考虑他人的思维方式、陈述的理由以及在他们背后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关联，理解、顾及他们的交往方式、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延伸到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

所以，只有教育才能使一切职业知识或科学知识化作丰富的成果。

我们大家的能力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摒弃“教导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创造面向世界、具有创新精神的“学习文化”新环境，使人们能够广泛获得具有实际意义的关于理解和谅解两者之间区别的基本常识。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建议有如跨文化日耳曼语言学这样的文化学科中，不把“international”（国际的）这个单词的前缀“inter”解释为一般的日常意义，而采用这个单词最原始的含义，即“zwischen”（之间）、“Wechselseitigkeit”（相互间）和“zusammen”（共同）。

女士们、先生们，二十五年来，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一直在为这一愿望而努力。为了今后使这一思路更加明朗化，我们要在比以前更为浓厚的跨文化氛围中建立一个共处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作为相同体和不同体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作为“有承载能力的共同体”的“第三规则”要不断更新。

这个新规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不是完全隔绝的，文化不是封闭的产物，它们的相同之处重叠、交叉在一起；因为文化的相同点合为一体也要归功于它们的相互影响，这是共同促成和文化变迁的创新因素。

我坚信，在第三规则范围内，对未来教育需求的共同思考将以合作达成共识并得以实现。

女士们、先生们，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目前在大约 80 个国家开展政治活动。应各国政府和伙伴机构的要求，我们讨论并制定不同的工作范围。

在中国，教育清晰地表现为我们共同工作的中心。尊敬的合作伙伴们，通过我们国际活动的观察，我今天在这里可以毫不犹豫的下一个定论，我们与贵国、与你们可以长期合作，这在国际上短期内是无出其右的。

之所以如此，是源于你们的基本信念，为了在贵国使社会、公共、经济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缜密的、各有侧重的改革。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精明的道路。不采用休克疗法，不生搬硬套“新东西”，不像在俄罗斯，把所有东西都托付给自由群体，而是在不同的政治行为领域开展一目了然、有一定风险但风险又不会太大的试点项目。

这些试点项目被拿来示范、检验、经过详细评估之后修改并实施。女士们、先生们，在改革和迅速实施方面，我们一定也可以向你们学习。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合作伙伴，我们同贵国、同你们开展的教育、政治、社会、公共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是让人精神大振的，内容是充满吸引力的，不管在专业还是人际交往方面，双方都获益匪浅。合作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挑战性的创造力，还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谁像我们这样推行教育政策、筹划改革，谁也就在描绘一幅未来生活的画卷。

最后请允许我援引教育部部长周济先生在给我的邀请函中强调的一句话，贵国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多年的合作让我们结下了充满信任、牢固而又深厚的友谊，在中德两国战略性伙伴关系中，教育部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合作前程似锦。

我们非常愿意接受这一任务，并将继往开来，不辜负合作伙伴寄予我们的厚望。

非常感谢教育部向我个人发出的邀请，感谢今天参加庆典的各位来宾，感谢诸位热情洋溢的贺词，感谢 1980 年至今的二十五年里大家给予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信任。